

大流感、战争与创伤记忆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创伤叙事

王 亭 亭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文学界对凯瑟琳·安·波特的研究多停留在其写作风格上,实际上,如果结合小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大流感爆发的背景来看,她的短篇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是一部创伤小说。其中的创伤叙事不仅有助于个人的创伤修复,更揭露了被帝国战争话语掩盖的集体创伤,是对历史叙事的一次积极补充和修改。

[关键词]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 大流感; 一战; 创伤叙事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1-0112-04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凯瑟琳·安·波特一生所著的作品数量不多,但篇篇都为精品。特别是她的短篇小说,文字考究,寓意深刻,风格独特,使她成为美国文学界公认的出色的文体家和现代派作家。也正因为如此,文学界对于她的认识仍多停留在其写作主题和写作风格上。以其优秀的代表作《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为例,小说中文体风格、宗教寓意和女性意识等都曾备受研究者的青睐,但是这些研究对小说所触及的社会和历史课题鲜有提及。《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主人公米拉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故事正是波特根据自己1918年感染大流感的经历写成的。这次降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灾难给美国社会造成了重创,也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波特在小说中用创伤叙事将回忆与史实相结合,不仅可以通过叙事来治疗创伤记忆,而且也是对这段刻意被忘却和被涂抹历史的一次积极的补充和改写。

一 被遗忘的大流感

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的标题取自圣经中的一个典故,《新约·启示录》第6章第8节中死神骑着一匹灰色马:“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1]代表死神的阴郁的灰色笼罩着整篇

小说,字里行间都让读者感到窒息和绝望。安·波特在小说里描绘的这个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灰色世界正是1918年大流感肆虐时美国的真实写照。世界大战期间爆发的传染病把战争和疾病变为了《启示录》中所说的死神的“权柄”,将无数人带入“阴府”。

1918到1919年间的大规模流行性感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传播到了以欧洲各国为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造成了大量的士兵及平民的死亡。保守估计,美国死于这场流感的人数高达55万,而“美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共计42万3千人,远远少于这个国家在10个月之内死于流感的人数。”^[2]这场大流感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3000万或4000万,远远高于一战中的战亡总人数1500万。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使1918年大流感成为人类历史上继公元前6世纪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公元14世纪的黑死病后的第三大致命瘟疫。

在西方,瘟疫与文学早就结下不解之缘。黑死病被薄迦丘写进了《十日谈》(Decameron),也被莎士比亚写进了《罗密欧和朱丽叶》中;狄更斯在自己的小说中详述了霍乱肆虐时的伦敦,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库拉》中的吸血鬼亦是霍乱的化身。瘟疫书写能以文学形式超越真实,触及人性、社会和历史

[收稿日期] 2014-08-12

[基金项目]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医学想象与帝国政治”资助(编号:13BWW044);2013年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医学伦理研究”资助(编号:13C834);2014年衡阳市社科基金项目“传统病伦理学视域下看瘟疫文学中的个人、社群和国家”(编号:2014D133)

[作者简介] 王亭亭(1982-),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等崇高的美学场域,因此备受文学家的青睐。但奇怪的是欧美的文学家们对1918年大流感视若无睹,如此浩劫在文学创作中几乎是一个空白。以受流感重创最严重的美国为例,整个20世纪美国文学中提及这次流感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如薇拉·凯瑟的《我们中的一员》(One of Ours)、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玛丽·麦卡锡的《玛丽·麦卡锡回忆录》(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大流感也只是被附带提及而已。整个20世纪的美国文学中只有波特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详细记述了这场让个人和社会都变得千疮百孔的灾难。除此之外,文学界似乎如患了集体失忆症一样,把这场灾难忘得干干净净。

患上失忆症的不仅是美国的文人们,不论是美国民众还是学界,大流感似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流感虽然是当时很多美国人刻骨铭心的经历,但是新闻记者门肯(H. L. Mencken)却注意到“流感很少被提起,大部分美国人明显已经忘记了它。”^[3]而更糟糕的是,在史书记载这场灾难时也只是在大战史注脚里几组干巴巴的数字而已。1918年之后的40多年里,只有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学者才从医学角度研究这次大流感,直到1957年亚洲型流感的爆发引发了社会焦虑,历史学家们才开始认识到从历史、社会和文化角度研究大流感的积极意义,不怪乎美国知名全球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Alfred W. Crosby)干脆把1918年大流感称作“被美国遗忘的大流感”,并以此命名了自己关于这次流感的研究著作。

但是,大流感的亲历者们真的能忘记这场噩梦么?为什么他们不愿提及自己的痛苦?是什么影响了学者们的研究方向,让这次大流感差一点“被遗忘”?被涂抹的过往能否真实地再现?波特试图在她的小说中给我们解答。

二 治愈创伤的个体创伤叙事

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说过:“创伤与肉体的伤痛不同,无法简单地治愈。创伤的经历来得太快,太突然,以至于当时无法完全被理解,直到这种如噩梦般感觉一次次重复出现时,幸存者们才会开始意识到。”^[4]因此,波特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一次肉体的患病历程,还是一次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

与《灰色马,灰色骑手》中的主人公米兰达一样,波特1918年在丹佛工作期间感染了流感并且一

度病危,医生认为她必死无疑;她当时工作的报社《落基山新闻》已经为她写好了讣告;家人也开始为她准备葬礼。连续九天受40度高烧折磨的痛苦被波特写进了小说主人公米拉达的潜意识中:“我巴不得在寒冷的山上雪地里……凛冽的寒风冻得她骨头都冰凉。”^{[5]164}虽然最终波特幸运地活了下来,却不得不面对比病痛更可怕的伤痛:波特曾与一位陆军中尉相爱,但她的爱人却被流感夺去了生命。正如小说中的米兰达从流感中死里逃生,才得知一直悉心照料她的爱人亚当因流感死于兵营的医院里。失去爱人的痛苦让“她那颗冰冷、麻木的心对自身也绝望地战栗”^{[5]186},甚至连出院后购买的物品都是“一双没有搭扣的灰色羊皮长手套,两双边上不绣花的灰色透明丝袜。”^{[5]186-187}作为幸存者的她感觉不到一丝生的喜悦,世界犹如一片死灰。

大流感带来的痛苦不仅体现在作者讲述的绝望的内容中,更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小说从一开始就打破了线性的叙事结构,故事从米兰达的梦境开事,梦中她看到了死神伴她左右,准备随时带她离开这个世界,给小说带来了一丝隐约的不安气氛。接下来的叙述中,安·波特通过调整叙事时距来控制叙述的节奏和重点。她采用了概要、省略等快节奏的叙事形式勾勒出故事的背景和场景,也意在小说中放慢甚至停止叙事进程,使叙事时间无限大于故事时间。这种停顿每每都出现在米兰达和亚当的约会时,以及米兰达病重时的幻觉中:虽然米兰达与亚当的约会只能选在她的工作间隙进行,但是故事中对每场约会的叙述都极为详尽,恋人之间甜蜜但无意义的对话都被一一记录,叙事的节奏慢到几乎停滞。而到米兰达病重时,故事时间则完全停止了,飞速转动的是小说的叙事时间,身体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的米兰达,却在意识中经历了“走向死亡的道路是布满痛苦的漫长路程”^{[5]177}。生命和爱情的美好,死亡和离别的痛苦都在叙述的停顿中被放大,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小说中高明的叙事方式,配合故事内容将受创伤者心理的混乱、困惑和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

与许多大流感的亲历者一样,波特首先也选择了对此劫难闭口不谈,她重新开始工作和写作,直到14年后才开始考虑把这段经历写进自己的小说中,而小说最终写成于1936年,距大流感爆发已有18年了。波特时隔多年才能再忆的伤痛的困苦或许能解答民众对于大流感的“失忆”,也许人们不是不愿再提,而是他们力不从心。弗洛伊德在对创伤者的研究中就注意到:“当记忆负载着痛苦感情的时候,它们常

常长期被回避,被压抑到脑海深处,压制到无意识中,主体不再有接触它的机会。”^{[6]74}对于遭遇过创伤的人来说,回避过去要比记住过去更容易。

然而创伤带来的痛苦又岂是回避得了的。就如卡鲁斯所说,创伤的特点就在于其一次次的重复,不断地折磨着创伤幸存者。就米兰达来说,当她得知亚当的死讯后就再也没有和任何人说到过他,似乎不再提起就可以避免伤痛,但是当她独自一人,“他一下子待在她身旁了,看不见,但是分明在场,一个幽灵,但是比他更生气勃勃”^{[5]188},而当她说出“啊,让我再看你一次”时,亚当又消失了。幻想中健康富有生气的亚当出现而后再消失不见无疑是典型的创伤后心理。虽然米兰达本能地压抑这段回忆,但是亚当从生到死的伤痛会再次上演。不难想象,波特在现实中也遭受了类似噩梦的一次次侵扰,然而她是幸运的,因为她选择用文字重述这段经历被认为是创伤治疗的关键方式。

波特的传记作者琼·吉文纳(Joan Givener)曾推测,波特1932年期间住在瑞士的巴塞尔,周边阿尔卑斯山的景色可能让她回想到丹佛的落基山和她1918年时在那里的经历,因此她开始构思这篇自传体性质的中篇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心理学家们认同叙述与创伤治疗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当创伤的受害者们把创伤的情形和后果通过语言讲述出来,可以获得一种宣泄,因此,“讲述对于创伤患者是一种治疗行为,创伤痊愈的标志之一,是患者能讲述他们的故事,回顾所发生的一切”^{[6]75}。因此,时隔18年后再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波特的叙事中虽然仍有痛苦和压抑,但是最终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她清醒过来,好像刚睡醒似的。啊,不行,这样可不对头,我再怎么也不能这样失魂落魄了。”^{[5]188}可见,《灰色马,灰色的骑手》是一次关于创伤的记忆,也是一次尝试治愈创伤的叙述。

三 修补历史的集体创伤叙事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创伤叙事有情感宣泄和修复创伤的双重作用,是一部典型的创伤小说。凯思琳·L·麦克阿瑟说,创伤小说“既是一种表现创伤性重负的方式,也是努力释放这种重负或者说对这一事件进行掌握和控制的方式。”^[7]安·波特的这部创伤小说不只是机械地将创伤的记忆保存下来以便释放创伤的重负,小说中巧妙加入的另一种声音,并有意地把个人创伤的叙述延伸到集体创伤的叙述中,从中可以看出她在对于大流感的主流话语中试图保存另一种历史真相的努力。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另一种叙述声音是关于战争的,虽然战争的副线相对而言并不完整,而只是只言片语的穿插在小说的疾病创伤讲述中,但却为叙述提供了一个补充背景,这个背景之下,米兰达的个人遭遇映射的是一战期间美国民众巨大的集体创伤。

事实上,若将波特在小说中对于战争和大流感的讲述稍作比较,会发现有关于战争的部分要比大流感的部分更明显和突出。战争的各种声音从一开始就不停地出现在主人公的生活中:米兰达刚到办公室就已经有人等在她的办公桌边向她推销自由公债——美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发行的公债;米兰达和同事汤尼躲在洗手间里交谈着若不买公债就会被开除的担忧;米兰达和红十字会的女人们去驻军医院劳军和卷绷带;她的男友亚当会讲起在军队里的拼刺刀训练;甚至看戏的幕间都有爱国者的演说。战争犹如一种枯燥又聒噪的声音,一直萦绕在她的身边。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流感这个字眼第一次明确地在小说中出现时,故事已经叙述过半了。在此之前,波特只提到它两次,而且叙述中满是不确定性。一次是米兰达和亚当约会时,她好奇亚当是如何延长长假的,亚当的回答是:“是他们给我的…没有什么理由。反正那儿人像苍蝇似的死去。这种古怪的新疾病。”^{[5]141}另一次是米兰达听办公室的人聊天,大家对传染源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德国潜艇偷带入港口,有的说是间谍把细菌喷射到空中,但是大家的态度都很平静,仿佛在议论另一个半球发生的事情。这两次简略的提及中波特没有使用“大流感”、“传染病”、“瘟疫”或任何类似的词,而且全部使用他人话语做叙述语言,波特好似有意地遮掩关于大流感的讲述。直到米兰达发病,她对房东太太说“我猜想是流行性感冒。”^{[5]163}房东太太的那一句“这是瘟疫啊,是瘟疫”^{[5]165}的叫喊才拉开疾病描述的大幕。此时被遮掩的大流感疫情才正式地展开在读者面前:没有救护车、没有床位,到处都缺医少药,戏院、商店、饭店都关门了,街上整天都是出殡的队伍。

无处不在的战争叙述和遮遮掩掩的疾病书写并不是波特颠倒了小说的主线与副线,这种奇特的对比正好是大流感时期美国社会对战争与疾病态度的真实写照:战争机器的轰鸣声把民众痛苦的呻吟声掩盖了。流行病学资料已有力地证实1918年大流感始发于美国,而且就爆发于当时全美第二大军营的福斯顿军营。卡罗尔·拜尔利(Carol Byerly)在其《疾病和战争的政治》一文中认为,美国军方为了掩饰自己失职,在流感报告中片面强调患病的病理甚至种族等生

理因素,而对于军营中营房过于拥挤、供暖不足以及士兵缺少御寒衣物等人为可控的因素几乎只字不提^[8]。这批关于大流感的最早报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整个美国社会对流感的看法:病痛只是个人的,为了国家在战争中的胜利个人的牺牲是必然的。因此流感大爆发时期美国公共卫生部不能在港口实施免疫隔离,“因为这样会减少军队的流动,甚至会切断对欧洲战场的兵力补给。”^[9]由于全国大部分的医生和护士被征召到军队服役,所以不论城市还是乡村都缺少医护人员。政府所做的除了关闭一些人群密集场所,最热衷的就是出台各项法令来规范民众的个人卫生习惯,如严禁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或吐痰,外出必须戴口罩等等。更为糟糕的是,由于战时严格的新闻审查,如大流感这种负面的、有损士气的新闻是不能被发布的,公众无法得知疫情的真实情况,只能在各种流言中胡乱猜测。美国民众只能在政府的掩饰和无能中对抗着致命的大流感,他们实际上是集体性地经历了战争和疾病的双重创伤。波特在小说中虽然只描绘了米兰达的个人遭遇,但她的遭遇也是每个美国人的遭遇。

对于普通的美国民众而言,战争与传染病带来的心理创伤是一样的。但是当大流感和一战几乎同时结束后,为了美化和合理化战争,战争的记忆以各种纪念日、战争回忆录、士兵公墓等形式被官方或人为地保存下来,成为了国家的主流意识。但是大流感带来的创伤却再一次在历史叙事中被抹去,只剩下几组枯燥的数据而已。民众的创伤和历史的真相成为了战争和疾病政治的牺牲品。对此,波特借小说主人公米兰达之口评论道:“尽是欺骗、撒谎。这就是战争对头脑和心灵造成的危害,亚当,你可能不能撇开这两样东西啊——战争对它们的影响比对肉体的危害更糟。”^{[5]159}

因此,波特在《灰色马,灰色骑手》中的创伤叙事不仅是在表达其个人的创伤经历,还是在再现当

时美国人民遭遇的战争和疾病的集体创伤。在被极力涂抹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她的故事留下了一段几乎被忘却的记忆和真相。

四 结语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是一篇结构和体裁堪称优秀的小说,结合其所触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大流感爆发的历史来看,更是一篇典型的创伤小说。其中的创伤叙事有助于个人宣泄情感和修复创伤,还被扩展到了集体创伤的范畴,是对帝国战争中被故意涂抹的历史叙事的一次积极补充和改写。

[参考文献]

- [1] 圣经—中英对照[Z]. 日本:国际圣经协会, 2005: 439-440.
- [2] Crosby Alfred W. 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207.
- [3] Allison Robert J. Influenza Epidemic of 1918-1919. History in Dispute, Vol. 3: Ame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1900-1945 [M]. Pursuit of Progress, Detroit: St. James Press, 2000:98.
- [4]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6: 4.
- [5] 凯瑟琳·安·波特.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M]. 鹿金,李文俊,屠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6] 王欣. 创伤叙事、见证和创伤文化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73-79.
- [7] 柳晓. 通过叙事走出创伤——梯姆·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创作评析[J]. 外国文学,2009(5):68-74.
- [8] Byerly Carol. The Politics of Disease and War: Infectious Dise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During World War I [D]. Denv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1.
- [9] 李颖. 1918年大流感对美国的影响初探[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1:14.

1918 Flu, War and Trauma Memory

—On the trauma narrative in *Pale Horse*, *Pale Rider*

WANG Ting-t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outbreak of WWI and 1918 flu into consideration, Katherine Ann Porter's *Pale Horse*, *Pale Rider* is a trauma novel, the trauma narrative in which is not only helpful in individual trauma recovering, but also displays the collective trauma covered by the discourse of imperial war, therefore it is a positive addition and modification to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Key words: *Pale Horse*; *Pale Rider*; 1918 flu; WWI; trauma narrative